程廷祚〈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辨〉述評

趙銘豐

摘要

本文將分析「程廷祚〈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辨〉」三個論述重點：「邏輯基點的部分謀合」，「深耕文獻的考辨策略」，以及「《疏證》不足舉隅」，藉此廓清程廷祚為《疏證》作〈辨〉的意義。

一、前言

今日學者鮮少論及程廷祚（1691-1767）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成績，如果以有無著述專書，作為考辨規模形成與否的鑑定標準，程氏之前，已有梅鷟（生卒年不詳。武宗正德八年，西元1513年舉人）《尚書譜》與《尚書考異》，針對《古文尚書》真偽展開「考辨方法」與「辨偽舉證」雙重審查。梅鷟之後，則有閻若璩（1636-1704）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（以下簡稱《疏證》）。

歷來學者關注《疏證》固無可厚非，只是持續放大單一著作，無疑存在改進空間。這個前提下，納入程廷祚其人其書的討論^[1]，乃是勢所必然。別於惠棟

關鍵詞 (Keywords)：程廷祚；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辨；閻若璩

Ying-zuo Cheng：Shang Shu Gu Wen Shu Zheng Bian；Ruo-qu Yan

趙銘豐：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班；E-mail: h0petea@yahoo.com.tw

^[1] 銘豐按：程氏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專著為《晚書訂疑》，其餘散見《青溪集》。

《古文尚書考》對於《疏證》「唯閻是取」的強烈認同，程廷祚《青溪集·卷四》〈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辨〉（以下簡稱〈《疏證》辨〉），對於《疏證》若干觀點，提出他「不與閻同」的回應。^[2]

本文將通過〈《疏證》辨〉與《疏證》的比較，以及程氏《晚書訂疑》關於〈《疏證》辨〉的補充資料，考察程廷祚質疑《疏證》的見解是否公允。

二、合者一：邏輯基點的部分謀合

雖然程廷祚極為嘆服《疏證》^[3]，就此認為程氏甄別《古文尚書》觀點類同《疏證》，恐怕過度隱晦程氏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主體價值。無可諱言，《疏證》確實是《古文尚書》考辨非常重要的典範，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以附錄十五則「閻君之論」，與徵引將近百條「閻若璩曰」，具體表達他「唯閻是取」的強烈認同。

與惠棟同時的程廷祚作法迥異，不能說程氏特意與《疏證》立異，畢竟程氏是在《晚書訂疑》完成後才見到《疏證》。^[4]程氏曰：

雖然，余之書多合於《疏證》，而仍有未合者，請試言之。《易》曰：「誣善之人其辭游。」「游」者，其言不能核實，雖多假借而不能掩其本然也。故晚《書》之可疑，莫大于來歷不明與多增竄《書傳》以飾其說，唯明于事理者，能熟思深察而得其故焉。晚《書》二十五篇，自謂出于孔安國，而安國之《書》，實則亡於永嘉。^[5]余與《疏證》合者，此一言而已。^[6]

程廷祚認為《晚書訂疑》跟《疏證》見解符同雖多，並不需要特別標舉，甚至可以簡約成「一言」。^[7]是以探究程廷祚前，「邏輯基點」的認知是如何

^[2] 見《青溪集》，頁78。程氏曰：「雖然余之書多合於《疏證》，而仍有未合者。」

^[3] 程氏道：「快哉斯書！使得見於前，則《訂疑》之作，可以已也。」《青溪集》，頁78。

^[4] 程氏道：「山陽儒者，潛丘閻氏，有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一書，余曩為《晚書訂疑》，求之弗獲。丙子（乾隆廿一年，1756）季夏，家葭園（程晉芳）始攜自金陵，時余書已成四載（乾隆十八年，1753）矣。」《青溪集》，頁78。

^[5] 晉懷帝司馬熾（307-313在位）時永嘉之亂，時永嘉5年（311）。

^[6] 見《青溪集》，頁78-79。

^[7] 銘豐按：所謂「一言」，程廷祚說的是《疏證》卷一，第二條：「惟不幸而永嘉喪亂，經籍道消。凡歐陽、大、小夏侯學，號為經師，遞相講授者，已掃地無餘。又何況祕府所藏，區區簡冊耶？故《古文尚書》之亡，實亡於永嘉。」（頁1079，右下）。這裡反映的是程廷祚看待「邏輯基點」與「辨偽舉證」輕重比例所反映的學術衡裁標準。此點個人曾經在拙作《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研究》特別標舉：「程廷祚用了相當精準的語言指出他與閻若璩之間考辨《古

在《古文尚書》考辨史漸次形成，就顯得格外重要。^[8]在此需將整個觀測中心前移，自元代黃鎮成甄別《古文尚書》史傳異同談起，《尚書通考》卷一〈壁藏異記〉曰：

愚按：孔子定《書》為百篇，遭秦滅學，孔氏藏之壁中；而伏生亦藏於壁。……及孔壁復出，安國定其可知者，多二十五篇，本皆科斗文字，而安國易以隸書，故謂之《古文尚書》。又復出伏生所合之篇五篇，并百篇之〈序〉一篇，凡三十一篇。合伏生二十八篇，為五十九篇，四十六卷。其餘錯亂摩滅，不可復知。悉送於王官，藏之秘府，又承認為五十九篇作《傳》。以巫蠱事起，藏之私家。前漢諸儒知有五十八篇，而不見孔《傳》，遂有張霸偽作〈舜典〉及〈汨作〉等二十四篇。……寥寥數百載間，乃至東晉而後，孔氏之《書》始出，其間混穀真偽，所不暇論。至於更歷傳受，循譎踵繆，斷章錯簡，周田豕亥，諒匪一端。且伏氏既有壁藏，不以《書》授錯，而以女子口授。孔壁《書》既傳都尉朝，馬、鄭諸儒，宜無不知。乃俾偽《書》肆行欺罔，是皆不能無疑者矣！嗚呼！《書》之不幸，一失於壁中之磨滅。再失於口傳之女子。三失於巫蠱之淪廢。百篇之義既莫覩其大全，幸存而可考者，其喪失又如此。世之學者，乃欲彊通其所不通，斯亦難矣！善乎朱夫子之言曰：「解其所可曉者，而闕其所可疑者。」則誠讀《書》不易之良法也。^[9]

黃氏說法有不少謬誤，譬如孔壁復出《古文尚書》，不是如黃氏所言「二十五篇」，而是「十六篇」，《古文尚書》「二十五篇」的數目，遲至《隋書·經籍志》方才現世，黃氏後續衍生張霸作《古文尚書》「二十四篇」亦屬不

文尚書》方面不謀而合的邏輯基點。」見《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研究》，頁53。

^[8] 銘豐按：所謂考辨方法的「邏輯基點」，應與晚《書》二十五篇文句所由來的「辨偽舉證」作出必要的區隔。主要原因除了「邏輯基點」的提出在「辨偽舉證」之前，再者，「辨偽舉證」舉證效力的檢視，比起考辨方法的「邏輯基點」，可謂更為龐雜。是是我認為目前與《古文尚書》考辨文獻相關的研究著作，處理「辨偽舉證」的態度往往呈現用力甚深卻成效不彰，或是著墨甚寡，我認為這些現象不代表「辨偽舉證」在「《古文尚書》學」中無足輕重，它所反映的乃是作者所持的研究方法，不能完整有效的整合文獻與解決問題，是是我認為關於二十五篇《古文尚書》組成文句所由來的「辨偽舉證」，其內在理路的重要性並不亞於「《古文尚書》學」中「邏輯基點」的甄別。

^[9] 引文出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故宮文淵閣本《四庫全書》第62冊：《尚書通考》，62-12左上至62-13左上。黃氏《尚書通考》完稿於元文宗天曆三年（1330）。

實，張霸偽作唯《百兩篇》，並無偽作《古文尚書》「二十四篇」。^[10]

所以提出黃氏觀點，在於他省察到《古文尚書》傳承系譜的眾說紛紜，縱然黃氏援引與裁斷史料多所謬誤，這卻是《古文尚書》考辨史上，首次有學者意識到羅列史傳異同的重要。特別黃氏提出的「三失說」，可視為《古文尚書》考辨學家提出漢代《古文尚書》存滅的初步心得。

黃氏之前，早有宋、元儒者吳棫、朱熹、王柏、金履祥、熊朋來，分別梳理《尚書》今、古文，與黃氏同時的吳澄亦撰《書纂言》，論述方向幾乎都是爭論《尚書》文字究竟應該是「文從字順」或是「佶屈聱牙」，他們並沒有像黃元鎮一樣，嘗試使用歷史研究的比較觀點切入。

由元入明，時移世易。考辨《古文尚書》整體見解依然創見不足。

舉例來說，與梅鷟同時代鄭瑗^[11]《井觀瑣言》，關於《古文尚書》真偽課題，他的看法是：

《古文書》雖有格言，而大可疑。觀商、周遺器，其銘識皆類今文《書》，無一如《古文》之易曉者。《禮記》出於漢儒，尚有突兀不可解處，豈有四代古書，而篇篇平坦，整齊如此。如〈伊訓〉全篇平易，唯《孟子》所引二言獨艱深。且以商《詩》比之周《詩》，自是奧古；而商《書》比之周《書》，乃反平易，豈有是理哉？〈泰誓〉曰：「謂己有天命，謂敬不足行，謂祭無益，謂暴無傷。」此類皆不似古語，而其他與今文複出者却艱深，何也？……予嘗論《書》與《孝經》，皆有孔壁《古文》，皆有安國作《傳》。而《古文書》至東晉梅頤始顯。《古文孝經》至隋劉炫始顯。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，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。《尚書》辭語聱牙。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，用此一種奧古文字，其餘記錄答問之辭，其文體又自尋常。^[12]

鄭瑗懷疑晚《書》字句組成順從度，固不脫宋代吳棫、朱熹的思路，然而鄭

^[10] 銘豐按：孔壁《古文尚書》的篇數由《史記》「十餘篇」至《漢書》「十六篇」再至鄭玄存目「二十四篇」，皆史有明文具體可徵，由於黃氏認知張冠李戴，混淆隋、唐後出篇數「二十五篇」與漢代篇數「十六篇」，又將漢代「二十四篇」與唐代「《百兩篇》」相互錯置，是以行文處處誤植。

^[11] 鄭瑗，字仲璧，莆田人。生卒不詳。成化（十七年辛丑，1481）進士。嗜學，為文章渾雄深粹，詩有唐人風，所著有《蠅笑稿外集》。

^[12] 引文出自：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12冊，《井觀瑣言》，卷一，頁674，左上。

氏將晚《書》因梅賾而彰顯，與劉炫述議《古文孝經》^[13]加以連結，其用意就是突顯梅賾學術品格不可信。鄭瑗意識到光憑梅賾單薄的傳記，恐怕不足入其偽造晚《書》的罪名，因此鄭瑗並舉「劉炫述議《古文孝經》」，其間代表的意義，就是考察孰為偽作《古文尚書》者重要問題意識。

是以明代中期梅賾能提出他個人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「邏輯基點」，就顯得異常重要，梅賾自序《尚書考異》曰：

《尚書》二十八篇，并〈序〉一篇，共二十九篇。秦博士伏生所傳，乃聖經之本真也。因暴秦焚書，藏于壁中，遭亂遺失，所存者止有此耳。伏生即以教于齊、魯之間，因為〈大傳〉三篇。漢文時求治《尚書》者，無過于伏生，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，傳之。蓋傳其文義講說，以發明正經云爾。景帝時所傳者，亦不過如此。至武帝時，孔安國等專治《古文尚書》，滋多于此矣。故孔臧〈與孔安國書〉曰：「《尚書》二十八篇，儒者以為上應二十八宿，不知又有《古文尚書》也。」可見武帝以前原無《古文尚書》，明矣。……至其所治《古文》一十六篇者，多怪異之說，及經書所引，皆不在其內，以故當時老師宿儒尊信正經，不肯置對苟從，據理辨難，不肯奏立學官。雖以劉歆〈移書〉之勤，猶謹攻不已。其間或滅或興，信之者或一二，不信者恒千百。其書遂不顯行于世。然其遞遞相承，蓋可考也。此先漢真孔安國之偽《書》，其顯末大略如此。^[14]

梅賾認為當世真《尚書》，僅有伏《書》二十九篇。伏《書》之外，「十六篇《古文尚書》」是孔安國偽作；「二十五篇《古文尚書》」更是偽作中的偽作。梅賾將漢代「十六篇《古文尚書》」湮沒，解釋成「多怪異之說……遂不顯行于世」。又將「二十五篇《古文尚書》」偽造，以「善為模倣窺竊之士」推斷之。

暫且不論梅賾是否簡化《古文尚書》真假錯綜的發展歷程，梅賾卓見，在於他指出長期以來關心晚《書》真偽者，匱乏史學脈絡的事實。所謂「史學脈

^[13] 銘豐按：據《隋書》卷三十二，〈志〉第二十七，「《古文孝經》一卷」條下謂：「孔安國《傳》，梁末亡逸，今疑非古本。」又「至隋，祕書監王劭，於京師訪得孔《傳》，送至河間劉炫。炫因序其得喪，述其議疏，講於人間。漸聞朝廷，後遂著令，與鄭氏並立。儒者誼誼，皆云：『炫自作之，非孔舊本。』而祕府又先無其書。」

^[14] 引文出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故宮文淵閣本《四庫全書》第64冊：《尚書考異》，64-3右上至62-3右下。

絡」，就是正視史籍文獻關於《古文尚書》生成與傳承的線索，梅鶯顯然意識到這個考辨前提，他以唯有「伏《書》」為真的認知，作為考辨《古文尚書》邏輯基點的起步。

以今日研究眼光來看，梅鶯切入角度不盡合理，可是他至少指出想要甄別真假《古文尚書》，就應該追蹤相關歷史材料源頭，梅鶯甄別《古文尚書》的考辨模式，與同時期學者相較的確非常出色。^[15]

從宋代吳棫、朱熹，到元代吳澄、黃鎮成，再到明代鄭瑗、梅鶯，學者們對於《古文尚書》相關文獻材料的考辨意識顯然愈趨精細，漸漸集中在孰為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「根柢」。何謂「根柢」？清初閻氏《疏證》如此釋義：

又按：天下事由「根柢」而之「枝節」也易；由「枝節」而返「根柢」也難。竊以考據之學亦爾。予之辨偽《古文》，喫緊在孔壁原有真《古文》，為〈舜典〉、〈汨作〉、〈九共〉等二十四篇，非張霸偽撰。孔安國以下，馬、鄭以上，傳習盡在於是。〈大禹謨〉、〈五子之歌〉等二十五篇，則晚出魏、晉間，假托安國之名者，此「根柢」也。（《疏證》，卷八，第一百一十三條，頁1421，左下）

閻若璩提出「根柢」說，其目的就是企圖解決懸宕已久的學術難題。

從梅鶯以唯「伏《書》」為真，作為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邏輯基點，到閻若璩明確指出真《古文尚書》，唯有「孔壁二十四篇」。其間差異，就是從梅氏徹底否認真《古文尚書》存在，轉變成《古文尚書》確實存在真與假的對壘，閻氏體現解決學術課題應有的核實態度。只是閻氏「節節皆迎刃而解」，反而引起之後學者更多思考，本文所要討論的程廷祚正是其中一位。

將閻若璩唯「孔壁二十四篇」為真《古文》，對照程廷祚「晚《書》」二十五篇，自謂出于孔安國，而安國之《書》，實則亡於永嘉，余與《疏證》合者，此一言而已」。可知程廷祚不認為鄭注〈書序〉「孔壁二十四篇」是真《古文尚書》，他認同《疏證》的「邏輯基點」，唯有「晚《書》」二十五篇，乃是假托孔安國之名行世；而真孔安國本《古文尚書》，雖然亡於永嘉之亂，未必盡喪江

^[15] 銘豐按：所謂「梅鶯的考辨模式」，包含「邏輯基點」與「辨偽舉證」雙重組成，且以專著形式呈現者謂之。我認為梅鶯已經開始有系統的關注史學中《古文尚書》的傳承線索，相較於明代之前的零星發言，與明代之後《古文尚書》考辨思潮的百家爭鳴，梅鶯確實是一位值得被表彰的先行者。清代學人不管知不知道梅鶯的著述，不管認不認同梅鶯的研究觀點，幾乎所有繼起考辨《古文尚書》者，都無可迴避的必須在梅鶯的考辨模式之上推陳出新。

右。就是因為同中有異，所以程廷祚必須具體表達他「不與閻同」的治《書》立場。^[16]

再分析程廷祚所理解的《疏證》，程氏認為決定晚《書》真偽與否，與其現世時間點息息相關。程廷祚解讀《疏證》的視角，恰好說明《古文尚書》考辨思潮發展至清初，學人們研究共同課題不謀而合的重點。

簡述以上歷程，乃是勾勒時代更迭，呈現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研究方法的多元觀點。自宋代晚《書》疑偽思想發軔，與其之後學術語言的比附因襲，都拘囿在晚《書》是否「文從字順」，這樣的考辨力道顯然是說服不了清代學者。特別自閻若璩開始，以及閻氏以降的學者們，更是執此多方議論。

本文所欲述評的程氏〈《疏證》辨〉，正是清代《古文尚書》考辨思潮之下，反覆鑽研上述議題的典型案列。

三、不合者三：深耕文獻的考辨策略

(一)「二十五篇」非出於「魏與西晉」

程廷祚認同《疏證》所言，「永嘉之亂」乃是真《古文尚書》存滅癥結。既

^[16] 銘豐按：何以程廷祚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邏輯基點與閻若璩《疏證》相較，屬於「部分謀合」，而非「全部謀合」？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程氏雖然自道「與《疏證》合者，此一言而已」，然此「一言」，上下截分為「晚《書》二十五篇，自謂出于孔安國」與「而安國之《書》，實則亡於永嘉」。兩人都認為「晚《書》二十五篇」係偽託孔安國，這是上文之所同；而下文「安國之《書》亡於永嘉」，程廷祚卻有真孔《書》永嘉之亂「亡於江右」的第一義，此與閻氏同；而第二義「江左猶存」的見解，卻與閻氏異。換言之，程氏認同閻氏真孔《書》亡於「永嘉之亂」之論，卻認為江左未必無存，程氏此立論前提，乃為鋪陳「劉宋」之際偽《書》方現。是以程氏雖以「一言」所同概括之，實際上經過末學全文分析，兩人的「一言之同」，同中有異。故兩人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「邏輯基點」為「部分謀合」，而非「全部謀合」。基於此，程廷祚「《古文尚書》考辨學」方能創造「不與閻同」的差異性。至於兩人立論是否合理，已於後文甄別檢驗。

銘豐再按：到目前為止，我的學力能為考辨《古文尚書》「邏輯基點」所下的定義是：「個人認為考辨《古文尚書》不能不進行溯源，必然是亡佚了一部真《古文尚書》；後起者才有以假亂真的著力點。」（《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研究》，頁57），換言之，如何確立《古文尚書》存在「真」與「假」的對壘，才是開展整個「《古文尚書》學」最重要的「邏輯基點」。再從整個《古文尚書》考辨史的高度鳥瞰，閻若璩以「根柢清，枝節明」的研究方法，重現了《古文尚書》經歷從有到無，由真變假的發展軌跡，並且修正梅鷟「漢與晉《古文尚書》」具偽的看法，讓《古文尚書》考辨史的研究躍升成為清代學者關注的焦點，閻若璩的治《書》成就，不僅僅是方法論的提出，而是經由閻若璩，「《古文尚書》考辨學」在清代取得了能見度極高的歷史舞台，並且獲得超過150位清代學者的討論。感謝審查委員對於「邏輯基點」相關問題的不吝提點，謹此補充說明。

然真《古文尚書》絕於「永嘉之亂」有相當共識^[17]，從這個時間點往前追溯，研究者必然要面對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，亦即孰為真《古文尚書》？〈《疏證》辨〉曰：

至晚《書》托始于鄭冲之授蘇愉，及皇甫謐載入《帝王世紀》，與見于晉、宋以上之著作者，余皆疑此為後人之假托增竄，而《疏證》直謂二十五篇出于魏與西晉，是大不然。當此之時，漢、魏石經，並峙於太學，歐陽、夏侯《尚書》未亡也。而馬、鄭之《傳》方盛，安國十六篇，雖無師說，猶有存者。斯時而忽造五百年人世所無之《書》，義無所取，其能造之者，又何必王肅、何晏、夏侯湛、摯虞、束皙之徒也。無端而張天下之目，以至於無所容，諸公之不智，未必至此。設使有之，則群議沸騰，事必彰於史策，今何為杳然乎？《疏證》誤信《隋史》與《正義》，不合一也。（〈疏證辨〉，頁79）

將「至晚《書》托始」至「後人之假托增竄」，與《晚書訂疑》「《隋志》與《正義》之誣」參看，可以更加清楚程氏思路：

穎達既修諸經《正義》，又預修《隋史》，故二書之言，若出一口如此。至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，則居然以孔《序》削除《漢·志》，且引《漢·志》作安國獻《尚書傳》矣。其謬妄又不待言。夫梅賾之奏孔《傳》，吾不敢謂無其事也，若二十五篇者，似又出於梅賾之後。史家既失其年歲，世儒莫究其由來。至開皇購募遺典之時，僞手繁興，劉光伯等方倚為古籍晚出之屏藩，其孰從而問之邪？況《隋·志》與穎達，德明既敢於追改《史》、《漢》舊文，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《帝王世紀》及《晉史》諸書以實其說？而謂所言授受源流，有一可信乎？（斯時書籍俱係手抄，鋅板未行，易於改竄故耳）又案：《隋·志》有欲蓋而彌章者。永嘉之亂，歐陽、大、小夏侯《尚書》竝亡，以四百學士肄業之書，且不能存於此日，則十六篇之亡必矣。十六篇既亡，而又安所得二十五篇者？（《晚書訂疑》，頁23，左上）

程廷祚認為孔穎達兼具編撰《尚書正義》與《隋史》的身分，他認為若孔穎

^[17] 惠棟《古文尚書考·卷上·辨正義四條》亦曰：「迄乎永嘉，師資道喪，二京逸典，咸就滅亡。（具《隋·經籍志》。）于是梅賾之徒，（僞《書》當作僞于王肅。王肅好造僞書，以詆康成，《家語》其一也。）奮其私智，造為《古文》，傳記逸《書》，掎摭殆盡。（詳《下卷》。）若拾遺乘而作飯；集狐腋以為裘（二語本朱錫鬯）。雖于大義無乖，然合之鄭氏逸篇，不異《百兩》之與中《書》矣。」（頁60，左下）。

達《尚書正義》關於晚《書》傳承登載不實，則《隋史》「晚《書》二十五篇」之說，自然也需要被質疑。程廷祚認為兩說所以互不矛盾，乃是源起孔穎達圓謊所需。程氏認為晚《書》偽作來自共犯結構，從隋朝「偽手方興」，到孔穎達「愧於良史學識」，與陸德明「追改《史》、《漢》舊文」，看似環環相扣天衣無縫的過程卻是錯漏百出。

當程廷祚面對《疏證》所言「二十五篇出于魏與西晉」^[18]，他便舉證閻說之誤。程廷祚認為閻若璩光憑《隋史》與《正義》，就斷定晚《書》二十五篇現世時間，恐怕不夠嚴謹。原因在於真《古文》不存，應當在「永嘉之亂」後。

換言之，「永嘉之亂」前，若偽《古文》已經行世，則真、偽《古文》並行，怎能瞞天過海，時人又怎會緘口不加議論？再檢閱《疏證》提及「永嘉之亂」處^[19]，對照晚《書》出於「魏與西晉」，程廷祚在此斷定閻若璩犯了考辨《古文尚書》根本性的矛盾。

程氏論點所以值得討論，是因為《古文尚書》考辨史的建立，目前文獻線索相對完備只有兩漢時期，程廷祚當時如是，現代也僅是增添若干竹簡資料。是以若能建立完整的清代《古文尚書》考辨史，了解清代犖犖諸家如何鋪陳考察《古文尚書》的研究進路，不失為是一種能提昇現代學者考辨思維進步的方式。這也是何以程廷祚謂「永嘉之亂」前，真、偽《古文》不能並行，值得我們重視。

(二) 梅賾獻《書》無據

程廷祚〈《疏證》辨〉第二個論述是「元帝時梅賾獻《書》」^[20] 是否可

^[18] 銘豐按：《疏證》謂「二十五篇出于魏與西晉（晉）」諸語，確實在《疏證》出現多達51次，詳見附表一：《疏證》「二十五篇出於魏與西晉」。

^[19] 《疏證》提及「永嘉之亂」計有4處，分別是：

- (1) 卷一，第二條：「及永嘉之亂，歐陽、大、小夏侯《尚書》並亡。」（《疏證》，頁1079，右上）
- (2) 卷五上，第六十六條：「惜永嘉之亂亡失，今遂不知中作何語。」（《疏證》，頁1192，左下）
- (3) 卷八，第一百十三條：「兩漢時安國之《尚書》雖不立學官（平帝時暫立），未嘗不私自流通，逮永嘉之亂而亡。」（《疏證》，頁1421，左下）
- (4) 卷八，第一百二十條：「竊意《古文書》至東漢始有《訓》、《註》。當時大儒亦止註三十四篇，未必及逸《書》。故有時合而為一，則如《漢志》所載；有時離而為二，則如《隋志》所載。合則永亡，晉永嘉之亂是也；離則僅存，晉元帝立鄭氏《尚書》博士是也。因嘆向來里中諸子，謂《書》關繫不在卷軸、篇數，且詆為枉用心。此予所不欲與深言者也！」（《疏證》，頁1441，左下）

^[20] 請參見附表二：《疏證》「晉元帝時梅賾獻《書》」八則。

信，程氏曰：

梅賾獻《書》之事，不見於《晉書》^[21]，竊意梅氏即有所獻，亦非今五十八篇之《書》與其《傳》也。余歷考典籍，而斷其出於元嘉^[22]以後。《疏證》則謂立於元帝^[23]，不過以〈荀崧傳〉有立《古文尚書》孔氏博士之語。^[24]夫兩漢所謂孔氏《古文》者，十六篇皆在外，都尉朝所受，與司馬遷所從問。及賈、馬所訓解，許氏叔重所纂輯，無非與伏生所同之二十九篇也。即孔穎達亦云：「賈逵、馬、鄭所注《尚書》，皆題曰《古文》，而篇數與伏生正同。」是也。孔《書古文》以盛行于東漢，故雖遭亂而不亡，是江左之立博士，以孔氏《古文經》耳（與伏生篇數同者）。永嘉大亂之後，十六篇既亡，偽《書》可以造矣。而其時儒林頓盡，復無能造之者，二十五篇非一時一手所能成。梅氏立乎元、明^[25]之間，安所得此《書》而獻之哉？賾之所獻，或即《古文經》，或別造孔氏之偽《傳》（非今五十八篇之孔《傳》則可），與五十八篇奚與哉？撰《晉書》者，蓋洞然於此。故《汲冢周書》詳述其本末，而獻安國壁中之《古文》者，反不得與不準齊名。則所以發其謬妄于不言之際者，至為深遠，《疏證》其猶未之思邪？不合二也。（〈疏證辨〉頁79-80）

程廷祚敘事思維是這樣：

1. 西晉：「永嘉之亂，儒林頓盡」，故江右「十六篇」亡。
2. 東晉：盛行江左，猶有存者。「梅賾獻《書》」與〈荀崧傳〉「立《古文尚書》博士」，程氏認為所獻可能是真《古文》，也可能是別造的偽孔《傳》。
3. 劉宋：元嘉時，第二部《古文尚書》二十五篇偽成。

程氏認為「梅賾獻《書》」不合理。

^[21] 指唐修本《晉書》。

^[22] 「元嘉」，劉宋文帝（劉義隆）年號（424-453）。程氏「《書》二十五篇見於劉宋元嘉說」，另可參見程氏《晚書訂疑·卷上》「〈東晉不見有晚《書》〉」（《晚書訂疑·卷上》，頁24，左下）與「〈晚《書》見於宋元嘉以後〉」（《晚書訂疑·卷上》，頁25，左下）。

^[23] 「晉元帝」，司馬睿，318-322年在位。

^[24] 《晉書·荀崧傳》卷七十五：「《古文尚書》，孔氏。」引文出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故宮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256冊：《晉書·荀崧傳》，256-243右下。

^[25] 「晉明帝」，司馬紹，323-326年在位。

乃因此事徒見孔穎達轉引自非今行本《晉書》，加諸《疏證》根據今行本《晉書·荀崧傳》，有立孔氏為《古文尚書》博士，遽爾斷定《古文尚書》之偽自此開始。《疏證》既然篤信晉元帝將精熟《古文尚書》者立為博士，又選擇將「梅賾獻《書》」一併輯錄，可見閻若璩刻意強化從「獻《古文尚書》」到「立《古文尚書》博士」的因果關係。在此，程廷祚則將今行本偽《古文尚書》面世，推遲至劉宋文帝元嘉年間。

只是程廷祚的時間序列顯然有問題。

「永嘉之亂」起於西晉懷帝，西晉迄愍帝告終，東晉自元帝踐祚。換言之，如果「永嘉之亂」是真《古文尚書》存滅關鍵，那麼跨越「永嘉之亂」，則真《書》滅絕，如果沒有梅賾先獻偽《書》，那麼〈荀崧傳〉《古文尚書》博士何能冊立？既然如此，則「江左之立博士」，應當就是偽《古文尚書》欺世盜名的開始。

若依照程廷祚不排除真《古文》「盛行江左，猶有存者」的第一假設推論，偽《古文》至劉宋方面世，則江左前後《古文》一真一偽，除非「永嘉之亂」後至「劉宋文帝元嘉年間」，又出現另一個「永嘉之亂」，否則如何解釋真《古文》二度佚失？

再依程氏謂：現世者可能是「偽《孔》傳」第二假設的邏輯推演，則《經》《傳》一體，釋《經》之《傳》若偽，則所釋之《經》，豈能真實無虞？是以此假設，已將《經》《傳》關係割裂，未盡合理。

是以程氏這兩個觀點，無論個別來看，或是相提並論都無法成立。更遑論這兩個假設，又與程氏認為真《古文》喪滅於「永嘉之亂」的大前提，存在根本性的矛盾。

當「永嘉之亂」正式成為程、閻認同，是《古文尚書》造偽事件的源頭，閻若璩必定也要面對這樣的質問，何以從西晉懷帝至東晉元帝十餘年間，《古文尚書》會在永嘉喪亂之後迅速出現偽本，且精熟偽本者，旋即被冊立為博士？除非偽作事件早已預謀，否則偽《古文尚書》何以能迅速的擠身廟堂？

對此，程廷祚雖然以偽《古文尚書》「非一時一手所能成」駁論，程氏同樣無法解釋，當他認為梅賾所獻《古文尚書》，以及〈荀崧傳〉冊立《古文尚書》博士，可能並非偽本。那麼，試問從「永嘉之亂」到「劉宋文帝」百餘年間，真《古文尚書》滅絕，何以悄然無聲？又偽《古文尚書》聲勢何以後來居上？

程廷祚指出「梅賾獻《書》」無據，確實可讓研究者重新思量此事是否合

理，只是單一的質疑，勢必需援引確鑿的文獻與之對應。這些模糊空間，雖然符合程氏自謂「晚《書》來歷不明」，與《晚書訂疑》若干立論。^[26]同樣顯示他面對這個問題的困境，與其他辨僞派的學者殊無二致。

(三) 真孔安國《古文》非「二十四篇」

程廷祚〈《疏證》辨〉提出第三則「不與閻同」，就是孔安國真《古文》是「十六篇」，而不是「二十四篇」。程氏曰：

安國得多十六篇，為《史》、《漢》之明文，……若其增竄之跡，則又可得而言也。「《尚書》五十八篇」，劉向《別錄》所云，今不可考。《藝文志》云：「《尚書古文經》四十六卷」。分而言之，二十九卷為伏《書》，十六卷并《序》為孔《書》，此無可疑議者也。其下忽有班氏自注云：「五十七篇。」顏師古引安國僞《序》以明之，又引康成《敘贊》云：「本五十八篇，後又亡其一篇，故五十七。」夫《藝文志》出于向、歆父子，而班固述之云爾，果如其言，《漢書》何不直云：「《尚書古文經》四十六卷，五十八篇」，而待固之注也？且向、歆校《書》時，〈武成〉未亡，焉可遽省其一？中秘之《書》，既無由而亡，豈因立于孝平之世，而十六篇遂留民間邪？是又不當云：「《古文經》有四十六卷」矣。語有過密，而愈增其瑕者，班固自注，顯有可疑，此豈師古輩之所知察耶！鄭氏之注〈書序〉，吾聞之矣，未聞其增二十四篇于伏《書》之外，為五十八篇也。使其有此二十四篇，必更為他僞《書》無疑。……而《疏證》竟執此以為安國增多之真《古文》，可怪甚矣！不思《漢書》之四十六卷，分載孔、伏之《書》。孔《書》所得者十六卷爾，今忽有二十四，則較之於伏，篇多而卷少，豈誠為張霸所造寂寥短簡者耶？穎達曰：「篇即卷也。」夫「篇」曰「即卷」，則「卷」亦可曰「即篇」，又何以同《序》之篇，或三或兩，而共一卷乎？觀其說之矛盾，則誣可知矣。……然則安國之《古文》增多者，十四篇而已，惡在其為十六也？無論損伏以益孔之不可，而以十四為十六，以二十二為二十四，則《漢志》「篇」、「卷」之數，無不從之而虛，況〈武成〉之亡，又有明證，而謂康成識不足以及此，猶存其目于〈書序〉之中，于理無可信者。……穎達謂伏《書》有三十三篇，除〈太誓〉在外，以

^[26] 即「〈東晉不見有晚《書》〉」（《晚書訂疑·卷上》，頁24，左下）與「〈晚《書》見於宋元嘉以後〉」（《晚書訂疑·卷上》，頁25，左下）二說。

二十八篇內出〈舜典〉、〈益稷〉、〈盤庚〉二篇，〈康王之誥〉，實則三家皆無此數（伏《書》無百篇之《序》，故不得有此《書》數）。又謂鄭注于伏《書》二十九篇之內，分出〈盤庚〉二篇、〈康王之誥〉、又〈太誓〉二篇，為三十四，既謬於伏，又與《序》違，康成何故而為此？是則穎達欲納偽《書》于鄭，則以鄭為「三十四」；欲附晚《書》于伏，則又以伏為「三十三」。顛倒任情，以申其五十八篇之數，而自甘蹈于惑世誣人，甚哉，穎達之悖也！且《正義》既云「鄭意師祖孔學，而賤歐陽」等，又云「庸生、賈、馬之倫，唯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，而鄭承其後，故鄭與三家所注皆同」。由此以推，則凡所增竄，皆可不攻自破矣。此數端者，吾能起閻氏而問之哉？

或曰：「二十四篇之目，誠出于偽造矣，而彼不據之以作書，何耶？」曰：「閻氏以為避難易者，固已得之。且此乃書成而謀證，故其篇不能同也。」或又曰：「何不即以二十五篇之目，竄入《敘贊》，以即真也？」曰：「安國所增，既不聞有此數，今所造又無〈九共〉之除八篇，以暗合于十六。以此乞靈鄭氏，庸有濟乎？」……迄今千數百年，猶令人想見其肺腸，而不知安國之真《古文》，止於十六篇，而無所謂二十四。《漢志》之《古文經》四十六卷，亦止於四十六篇，而無所謂五十八。此雖廣窺其說，巧設其數，而情見勢拙，未足以欺識者。不意好學深思，長于辨駁之閻氏，已墮其雲霧，而無以自出矣。不合三也。（〈疏證辨〉，頁80-84）

一般認為「十六篇」真孔《書》篇目，僅存孔穎達《尚書正義·堯典》鄭注〈書序〉。由於《尚書》今、古文有「四十六卷」、「五十七篇」、「五十八篇」，各種不同排列組合，再加上〈武成〉、〈泰誓〉、〈書序〉，是否要納入計算，總是爭議不休。程廷祚看法與諸家異處，在於他緊扣孔穎達「篇即卷也」，嚴格的把「四十六卷」設定為「四十六篇」。

換言之，真孔《書》加上伏《書》，總篇目就只能是「四十六」，在這個大前提下，「四十六」這個數字，就是由「伏《書》二十九篇」加上「真孔《書》十六篇」再加上「〈書序〉一篇」^[27]，程廷祚認為這才是整體《尚書》篇目最真

^[27] 銘豐按：關於「〈書序〉」與整體《尚書》數目問題，程廷祚於〈《疏證》辨〉謂「伏《書》無百篇之〈序〉，故不得有此《書》數」。是以程氏認為伏《書》篇目不含〈書序〉。那麼，〈書序〉又是自何而來？程氏《晚書訂疑·卷中·書序》提到「疑與安國壁中《書》同出，故司馬遷從安國問而載於《史記》，歐陽、夏侯三家皆不言〈序〉，後漢孔學既行，注《尚書》

實的記載。是以他認為後續衍生「班固自注」、「康成《敘贊》」，都是「語有過密，而愈增其瑕」。

以此對照程氏所謂閻若璩認同「真孔《書》二十四篇」，再檢閱《疏證》提及「真孔《書》二十四篇」^[28]，可以發現兩人見解雖不一致，並不影響他們質疑晚《書》偽作。因為《疏證》「真孔《書》二十四篇」，不過是從〈九共〉再析出九篇，「真孔《書》二十四篇」加上「伏《書》」析分後「三十四篇」，總數就符合尚書「本五十八篇」^[29]，當「五十八篇」與「四十六卷」，篇與卷的數量無法相容，就以某些篇章「或三或兩，共為一卷」帶過。雖然這樣的解釋，在程廷祚看來純粹是為湊數。

實際上以辨偽派持「真孔《書》存在」觀點平議此事，「篇」與「卷」不相等，並不會改變他們認為「真孔《書》」確實存在的事實，程氏「四十六卷」等

者遂皆注〈序〉，則〈序〉出於孔，信矣。」（頁30，右上）

由於「歐陽、夏侯三家」傳承為伏《書》今文系統，故不聞〈書序〉；而「十六篇」孔壁《古文》篇目既定，自然不含〈書序〉，其間又不聞〈書序〉另外現世與藏於中秘之事，因此程氏遂以「司馬遷從安國問」而「〈書序〉存於《史記》」，推論「〈書序〉」與「十六篇孔壁《古文》」同出。而「伏《書》二十九篇」加「孔壁十六篇」再加〈書序〉一篇，即符應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云「《尚書古文經》四十六卷」的數目，這樣的立論當然是以「卷即篇也」為前提得到的結果。

是以審查委員提到何以計算結果為「四十六卷」時，〈書序〉別於伏《書》與孔《書》，以外加形式包含在內？而「五十八篇」時，何以〈書序〉卻不在其中，關於此點，可以通過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與閻若璩《疏證》對於「五十八篇」的計算方式來看：

(1) 惠棟《古文尚書考·卷上·孔氏《古文》五十八篇》謂：「桓譚《新論》云：『《古文尚書》，舊有四十五卷，為五十八篇。』蓋賈、馬《尚書》三十四篇，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為五十八。內〈盤庚〉三篇同卷，〈太誓〉三篇同卷，〈顧命〉、〈康王之誥〉二篇同卷，實二十九篇。逸《書》〈九共〉九篇同卷，實十六篇，合四十五卷之數。（篇即卷也。）與桓君山說合。（《藝文志》四十六卷，兼〈序〉言之。）」（頁58，左上）

(2) 閻若璩《疏證·卷二·第十七條》曰：「一謂梅賾《書》並〈書序〉一篇為五十九。不知定著仍五十八篇，〈序〉已各冠其篇首不復為一篇也。」（頁1111，左上）

銘豐再按：「四十六卷」之外，即有桓譚「四十五卷，五十八篇」不含〈書序〉的計算方式，那麼，所謂的「五十八篇」含〈序〉是否當為「五十九篇」？又何以閻若璩認為無所謂「五十九篇」之說？原因在於閻氏認為〈書序〉已各冠篇首，是以伏《書》析合為三十四，孔《書》析合為二十四，總數即合於「五十八篇」之說。總的來說，這是解讀文獻立場不同所致。感謝審查委員對於「〈書序〉」問題的不吝提點，謹此補充說明。

^[28] 請見附表三：《疏證》「真《古文尚書》二十四篇」五則。

^[29] 《疏證》卷一第四條曰：顏師古又於五十七篇之下，引鄭康成《叙贊注》曰：「本五十八篇，後又亡其一篇，故五十七。」愚嘗疑不知所亡何篇？後見鄭康成有言「〈武成〉，逸《書》，建武之際亡。」則知所亡者，乃〈武成篇〉也。

於「四十六篇」，充其量只是別異閻若璩、惠棟^[30]，屬於文獻資料的另一種解讀^[31]，這個解釋結果並不會改變辨偽派，將孔穎達「古《書》二十五篇」加「伏《書》三十三篇」，等於「五十八篇」，整體謬誤的指陳。^[32]

四、餘論：《疏證》不足舉隅^[33]

從「邏輯基點部分謀合」，接續鋪陳「不合者三」，〈《疏證》辨〉末段行文，繼續闡述《疏證》不足，程氏曰：

或曰：「《疏證》之病何在乎？」曰：「在不知晚《書》善於設詐也。」……而其他辨說，猶有可議者。謂《古文》當別有〈舜典〉、〈大禹謨〉及〈益稷〉，以帝舜之事尚多，如《孟子》「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父母」；「祇載見瞽瞍，夔夔齋栗」；「不及貢，以政接于有庠」，與〈萬章〉所引諸語，此別有〈舜典〉之證，是固然矣。《論語》末章有「堯曰，咨」一節，《孟子》有引「放勳曰」五句，所關有大於舜之逸事者，豈又當

^[30] 惠棟《古文尚書考·卷上》，頁58。即有肯定〈孔氏《古文尚書》五十八篇〉與〈鄭氏述古文逸《書》二十四篇〉的立論。

^[31] 《晚書訂疑·卷中》，頁38右下。程氏即曰：案：漢代偽《書》無所謂二十四篇，惟孔《疏》有是說，謂出於鄭康成，而載於劉向《別錄》者，然劉在鄭前，若劉先見之，則《藝文志》當有其目矣，《志》既杳然，而鄭又何以知之？以為安國之《書》，則當為十六篇，而安國亦非偽；以為張霸之《書》則當為《百兩篇》，而其數何為十六？其說之錯互虛誕如此，愚前已刺其故而闢之矣。乃近日山陽閻百詩氏、元和惠定宇氏，皆能真言晚《書》之偽者，而於是說則篤信焉，愚所未解也。閻氏《疏證》，愚別有辨，見《青溪存稿》（銘豐按：即《青溪集》）。

^[32] 惠棟序《晚書訂疑》曰：「反覆于《堯典·正義》，見所載鄭氏二十四篇之目，恍然悟孔氏逸《書》具在，因作《古文尚書考》二卷。及讀縣莊之書，宛如閉門造車，不謀而合轍。」（《晚書訂疑》，頁17）

銘豐按：程廷祚否定「二十四篇」真實，斷定「安國十六篇不傳」，其見解與惠棟有異，惠〈序〉對此卻全然不提。我推測原因可能有二：其一，惠棟無法圓滿解釋兩者的差異，平心而論，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考索隋、唐文獻的深度，確實不如程廷祚《晚書訂疑》，是以惠棟作〈序〉絕口不提。其二，我認為惠棟對於這個問題並非視若無睹，而是考量兩人推論過程不同，不致影響他們認定「二十五篇」作偽的共識，在這個大前提下，考辨者的獨立見解是允許存在的。以此對照程氏「山陽閻百詩氏、元和惠定宇氏，皆能真言晚《書》之偽者，而於是說（銘豐按：指「二十四篇」為真），則篤信焉，愚所未解」，可知二人考辨《古文尚書》，面對見解的歧出，確實各有不同的側重與解讀。

^[33] 《疏證》的見解請參見附表四：《疏證》「〈舜典〉別有成篇」與附表五：《疏證》「《法言》論〈稷棄謨〉」。

別有〈堯典〉乎？太史公曰：「《書》缺有間矣。」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，而斤斤唯《書》之是求，似非古人之所出也。至禹之言在〈皋陶謨〉者，已不為少，何待別有〈禹謨〉？若分〈皋陶謨〉為〈益稷〉，名不稱實，本屬《序》之多事。今《疏證》又據揚雄之言，「言合稷契之謂忠」，謂當有〈稷契謨〉。蓋皆二十四篇之偽說深入于胸中，而無如之何也。聞〈益稷〉一名〈棄稷〉，〈益稷〉則二人，〈棄稷〉則一人，而要與契無與，〈法言〉雖可取證，而趙岐之注《孟子》，今莫由驗其虛矣（岐言《古尚書》百二十篇，逸《書》有〈舜典〉之敘，亡失其文）。（〈疏證辨〉，頁84-85）

散見古籍文獻逸《書》片語，是否應被納入「真孔《書》十六篇」？《疏證》持肯定態度，程廷祚則持反對立場。程氏在此特別商榷〈舜典〉與〈皋陶謨〉分篇問題。

有關登載堯、舜事蹟的若干條文，是否為逸《書》？本就人言言殊。趙《注》是否可信，關鍵在於信之者必須連帶舉證，趙岐是否有誤解或誤信文獻的情況發生，閻若璩相信趙《注》真實，也只能心虛的以「心知其意者道耳」帶過；程廷祚卻是直接否定趙《注》，他認為趙《注》「今莫由驗其虛矣」！並且舉出「堯」例，說明如果「別有〈舜典〉」可以成立，那麼「別有〈堯典〉」是否也該援例？

後續則是〈益稷〉是否本為〈棄稷〉。程氏認為《疏證》雖將《法言》〈稷契〉與〈皋陶謨〉對舉，不代表〈稷契〉就是〈棄稷〉，更遑論《疏證》還認為〈益稷謨〉應該更名〈棄稷謨〉。程廷祚認為〈益稷〉人物包含「益」與「稷」（二人）；〈棄稷〉則指周朝始祖（一人）。不管是〈益稷〉還是〈棄稷〉，又跟《法言》「〈稷契〉」商朝始祖「契」無涉。

程廷祚認為《古文尚書》考辨者，極容易因為深求文獻導致解讀過當。這種「過當」現象頻頻出現，乃是肇因「二十四篇偽說」深具人心。程氏以「孔安國真《古文》十六篇不傳」^[34]為大前提，推理出「二十四篇」《古文》乃是訛傳，他用最簡單的思維否定《尚書》存在分篇問題。

嚴格說來，程氏舉證效力並不嚴謹，還是落入各說各話的窠臼。^[35]他忽略了

^[34] 請見《晚書訂疑·卷上·安國十六篇不傳》，頁19。

^[35] 銘豐按：程廷祚對此多所議論，惠棟也曾對此進行過討論，《古文尚書考·卷上·辨《尚書》

處理這樁公案，深求文獻乃是絕對而且必須，值得省思的問題，在於考辨者明知孤證難立，何以仍有提出見解的勇氣？^[36]

五、結語

透過程廷祚〈《疏證》辨〉型塑的《古文尚書》考辨史，可以輔證清初《古文尚書》考辨思潮，辨偽一派在閻若璩之後，內部路線並不是「唯閻是取」的單一發展，而是夾纏在漢代真孔安國《古文尚書》，傳世的「有無」、「篇數」，以及偽孔安國《古文尚書》暨偽孔《傳》，斷代工程的擺盪爭論。

在此必須提出，關於《古文尚書》考辨課題，並不能以絕對真偽的預設立場作為立論前提，以及據此導出研究者期待的必然結果。

因為從每個單字釋義、單句本身、句組之間，以及整體《古文尚書》文本的語境脈絡，當研究者企圖決斷與舉證，相關內容究竟孰真孰偽的同時，研究者提出的立論憑據，其合理性的相對辨證，都將隨著所欲證明標的不同，產生程度不一的調整與位移，並且衍生諸多超乎研究者意料之外的繁複變化。

是以欲甄別此命題，研究者對於《古文尚書》的授受傳承與歷史材料，更該保持適度的敬意與想像力。

致謝

分篇之謬》，就羅列幾近相同的命題。

^[36] 銘豐按：對此，劉人鵬教授曾經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，值得研究者思考：「就細部的考證來說，二派都有錯誤；但就像一場比賽，不在於犯錯違規的多少，而在於得分的多少。」請見《閻若璩與《古文尚書》辨偽：一個學術史的個案研究》，頁428。

銘豐再按：劉氏所指雖為「辨偽派」與「護真派」的得失，不妨也可以作為理解辨偽派內部多元辨證的參考進路。話雖如此，我仍然認為這是現代研究者的概括性思維，不能完全作為理解清代《古文尚書》考辨諸家治學成績的憑藉。原因在於當《古文尚書》處於被質疑、被考證的階段，研究者「犯錯違規」的問題是不存在的。對於當事者而言，總是認為自己才是穩操勝券的一方，怎麼可能會有失分的情況發生。因此所謂的「比賽」，是一種後設性，濃縮時空概念的描述，並不存在立即時間先後的「此發」則「彼發」，學者之間的辨駁，往往是斷點與斷點的關係，缺乏及時的相續性，把他們的考辨視作比賽形式的作法，展現的是現代研究者抽離當時情境的想像力，事實上也跟諸家考辨《古文尚書》所得「分數」的關係不大。再進一步講，或許「分數」也只是比喻，只是異時異地，對於辨別真偽《古文尚書》的切入角度往往眾說紛紛，如此一來，評分的標準是什麼？如果這個競試沒有標準，「分數」的意義又是什麼？因此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，至今仍莫衷一是。

本論文得力於審查委員們不吝指瑕惠賜卓見，助益末學實多，經修訂為今本，謹此申謝。

附表

表一：《疏證》「二十五篇出於魏與西晉」^[37]

01. 然此《書》出於魏、晉之間，去康成未遠。而康成所註百篇〈書序〉，明云某篇亡，某篇逸。彼豈無目者，而乃故與之牴牾哉？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，一一補綴，則〈九共〉九篇，將何從措手耶？此其避難就易，雖自出於矛盾，而有所不恤也。嗚呼！百世而下，猶可以洞見其肺腑，作偽者亦奚益哉？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七條，頁1094，右下)
02. 魏、晉間《書》出，始以「后羿之田」轉而為「太康之田」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十三條，頁1102，左下)
03. 又按《書大序》云：「伏生年過九十，失其本經，口以傳授」。此亦是魏、晉間，「衛宏使女傳言教錯之說盛行」，故撰《序》者採入，而不覺其於史文相背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十四條，頁1105，上)
04. 嗚呼！其果安國之舊耶？抑魏、晉之間假託者耶？ (《疏證》，卷二，第十七條，頁1109，右上)
05. 王肅，魏人。孔《傳》，出於魏、晉之間。後於王肅。《傳》、《註》相同者，乃孔竊王，非王竊孔也……凡此《書》，出於魏、晉間所假託者，皆歷有明驗，而世猶遵用之而不悟，惑之不可解，至矣！ (《疏證》，卷二，第十八條，頁1116，下)
06. 此《書》出於魏、晉之間，安得預見之而載之。《集解》未可以是為沖誣，然則此《書》實始授自沖云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二，第十九條，頁1122，右上)
07. 此《傳》之為魏、晉人所假託，皆歷有明徵。又不獨前所論「三年喪」，用王肅說。及此用毛《傳》文而已也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二，第二十二條，頁1127，右下)
08. 余然後知此晚出於魏、晉間之《書》。蓋不古不今，非伏非孔，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二，第二十三條，頁1128，左下)
09. 凡此《書》出於魏、晉之間，羣言淆亂之日，皆歷有明徵。而世之儒者，必欲曲為文解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二，第二十六條，頁1141，左上)

^[37] 「文淵閣本《疏證》」：採用孔穎達等撰：《四部要籍注疏叢刊·尚書·尚書古文疏證》（北京：北京中華書局，1998年8月）本。

10. 至魏、晉間竄入〈大禹謨〉中，亦幾沈埋者七、八百年。有宋程、朱輩出，始取而推明演繹，日以加詳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二，第三十一條，頁1146，右上)
11. 自王氏誤標茲義，宗之者尤盛於魏、晉間。若孔《傳》者，殆亦魏、晉間，王學之徒也哉！ (《疏證》，卷四，第五十三條，頁1160，右下)
12. 魏、晉間作《書》者，似以此為逸《書》之文。……蓋魏、晉間，此人正以鄙薄偽〈秦誓〉不加熟習，故不覺己之所撰，釐革之未盡。 (《疏證》，卷四，第五十五條，頁1163，左上)
13. 唯魏、晉間，孔安國《書傳》出，始云「鬱陶哀思」也。 (《疏證》，卷四，第五十六條，頁1164，右下)
14. 魏、晉間，孔《傳》竟認為「哀思」殆無足怪。 (《疏證》，卷四，第五十六條，頁1166，右上)
15. 偽作《古文》者，生於魏、晉間時，皆以〈書序〉為孔子作，故所撰二十五篇，盡依傍之。 (《疏證》，卷四，第六十條，頁1174，左下)
16. 魏、晉間，孔《傳》出，始有是說。 (《疏證》，卷四，第六十條，頁1175，右上)
17. 余亦謂〈冬官〉亡。魏、晉間，作《書》者以〈王制〉補之……大抵魏、晉間，此人學亦盡博，材亦盡富，不肯專主一說，以使人可測。其亦柳子厚所謂「衆為聚斂，以成其書者」與？ (《疏證》，卷四，第六十二條，頁1184，下)
18. 偽作者，偶忘為三代王者之師，不覺闖入筆端。則此《書》之出魏、晉間，又一佐已。 (《疏證》，卷四，第六十四條，頁1189，右上)
19. 別有逸《書》〈舜典〉，故魏、晉間，始析為二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五上，第六十五條，頁1190，左下)
20. 按吳氏《尚書纂言》，不信魏、晉間《古文》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五上，第六十五條，頁1192，左下)
21. 距魏、晉間不甚遠，古文孔《書》未出，二篇猶合為一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五上，第六十五條，頁1193，左上)
22. 又按〈書序〉引之，各冠其篇首者，魏、晉間，孔安國本然也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五上，第六十九條，頁1207，左上)
23. 魏、晉以還，右卑於左。是古者尚右；今者尚左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五上，第七十條，頁1212，左上)
24. 故魏、晉間人，遂有假古題，運古事，以撰成二十五篇《書》，以與真《書》相亂。亦其時風尚所致，非特能鑿空者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五上，第七十二條，頁1216，右上)
25. 竊意此偽作者，生於魏、晉間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五夏，第七十二條，頁1218，左上)
26. 偽作《古文》者，幸其生於魏、晉之間，去古未遠，尚知此等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五夏，第七十二條，頁1219，右下)
27. 如此魏、晉間人，竟以世所童而習之書，書且開卷，便見忘其采用……或問：子以「禹抑鴻水」，魏、晉間人，忘其采用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五下，第七十七條，頁1231，右下)
28. 皆魏、晉間忘其采用者……魏、晉間出，今也徇今而違古……固魏、晉間本之，所由分乎？ (《疏證》，卷五下，第七十八條，頁1232，左下)
29. 而魏、晉間，《書》乃出。 (《疏證》，卷六上，第八十一條，頁1256，左上)

30. 此《傳》出魏、晉間，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「孟津」……魏、晉間，《古文書》錯認「孟津」為在河之南。 (《疏證》，卷六上，第八十五條，頁1292，左上)
31. 魏、晉間，名漸諱。易孔安國《傳》，以「孟津」在洛北，《書》與《傳》同出一手。 (《疏證》，卷六上，第八十六條，頁1293，右上)
32. 殆安國當魏、晉，却身繫武帝時人耳。 (《疏證》，卷六上，第八十七條，頁1302，右上)
33. 王伯厚又因而廣之，下及魏、晉地名。 (《疏證》，卷六上，第八十八條，頁1303，右下)
34. 自與魏、晉間偽孔《傳》不合。 (《疏證》，卷六下，第九十三條，頁1346，左上)
35. 《書》出魏、晉間，又得一證……唯魏、晉間，《書》始作「波」，與《漢書》同。 (《疏證》，卷六下，第九十三條，頁1348，右下)
36. 豈非〈泰誓〉之文，出於魏、晉間人之偽撰者耶？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九十八條，頁1378，左下)
37. 《古文書》二十五篇，出于魏、晉，立於元帝，至今日而運已極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九十九條，頁1379，右下)
38. 以輔嗣為本，而摹脫之乎？其出魏、晉間可知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百條，頁1381，左下)
39. 姚際恒曰：……若魏、晉間，無由觀逸《書》，但止依傍〈書序〉為說，而不顧與史背馳，真《古文》、偽《古文》，于茲又見一斑云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百條，頁1384，左上)
40. 魏、晉間，此人似認此二句為一連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百零三條，頁1389，右下)
41. 益驗《書》出魏、晉間。即魏、晉間人之手筆云爾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百零三條，頁1392，左下)
42. 只是魏、晉間人所作。又曰：「傳之子孫，以貽後代。」漢時無這般文章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百零七條，頁1401，右下)
43. 嘗謂魏、晉間，《書》多從《漢書》來者，豈無徵哉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百一十二條，頁1406，左上)
44. 《書古文》出魏、晉間。 (《疏證》，卷八，第百一十三條，頁1420，右上)
45. 〈大禹謨〉、〈五子之歌〉等二十五篇，則晚出魏、晉間，假托安國之名者，此根柢也。 (《疏證》，卷八，第百一十三條，頁1421，左下)
46. 總之，《古文》假作於魏、晉間，今文則真三代。故其辭之難易不同如此。 (《疏證》，卷八，第百一十四條，頁1422，左下)
47. 此《書》出魏、晉間，豈得預窺杜《註》！ (《疏證》，卷八，第百一十九條，頁1439，右下)
48. 〈書序〉細弱，只是魏、晉人文字，陳同父亦如此說。……《尚書·孔安國傳》，此恐是魏、晉間人所作，託安國為名。 (《疏證》，〈附錄〉，頁1474，左上)
49. 則可證西晉時，未有別〈虞書〉、〈夏書〉而為二者。逮東晉梅氏《書》出，然後《書》題、卷數、篇名，盡亂其舊矣！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四條，頁1085，左下)

50. 又按：吳文正公《尚書叙錄》，信可爲不刊之典矣！然其誤亦有六：一謂孔壁真《古文書》不傳，不知傳至西晉永嘉時，始亡失也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二，第十七條，頁1111，右上)
51. 又按：孔穎達於〈盤庚·小序〉下，引：東哲云：見孔子壁中《尚書》，「將治亳殷」，作「將始宅殷」。與世行本不同。益足證西晉人猶見《古文經》；而東晉則失之矣！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二百零五條，頁1397，左上)

表二：《疏證》「晉元帝時梅賾獻《書》」

01. 東晉元帝時，豫章內史梅賾，忽上《古文尚書》，增多二十五篇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一條，頁1078，右上)
02. 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，距東晉元帝尚百餘年，《古文尚書》十六篇之亡，當即亡於此百年中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二條，頁1079，右上)
03. 若元帝時，祕書猶有存者。則梅賾所上之《傳》，何難立窮其僞哉！唯祕府既已蕩而爲煙，化而爲埃矣！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二條，頁1079，左下)
04. 又按「東晉元帝時，梅賾上《書》者」。草廬之言，實從孔穎達〈舜典·疏〉來，與〈經籍志〉合。但穎達又於〈虞書〉下引《晉書》云：「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。」前字疑譌，不然，前晉祕書見存，僞《書》寧得施行耶！且今《晉書·荀崧傳》：「元帝踐祚，崧轉太常。時方修學校，置博士。《尚書》鄭氏一人；《古文尚書》，孔氏一人。」則孔氏之立，似即在斯時。穎達所引《晉書》乃別一本，今無可考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二條，頁1080，左上)
05. 逮東晉元帝時，梅賾忽獻《古文尚書》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七條，頁1092，左下)
06. 東晉元帝時，汝南梅賾奏上《古文尚書》，乃安國所傳。其篇章之離合；名目之存亡，絕與兩漢不合。 (《疏證》，卷二，第十七條，頁1109，左上)
07. 《古文書》二十五篇，出于魏晉，立於元帝，至今日而運已極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九十九條，頁1379，右下)
08. 離則僅存，晉元帝立鄭氏《尚書》博士是也！ (《疏證》，卷七，第九十九條，頁1441，左下)

表三：《疏證》「真《古文尚書》二十四篇」

01. 「十六篇」亦名「二十四篇」。蓋〈九共〉乃九篇，析其篇而數之，故曰「二十四篇」也。鄭所註《古文》篇數，上與馬融合，又上與賈達合，又上與劉歆合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三條，頁1080，右下)
02. 然則〈汨作〉、〈九共〉二十四篇，必得之於孔壁。而非采《左》氏、按〈書序〉者之所能作也。 (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三條，頁1082，左上)

03. 余曰：非也！安國得多二十四篇，原無〈泰誓〉。故偽〈泰誓〉在當時，亦存而不廢。至馬融、王肅，始覺其偽耳。
（《疏證》，卷一，第七條，頁1092，右上）
04. 孔壁原有真《古文》，為〈舜典〉、〈汨作〉、〈九共〉等二十四篇，非張霸偽撰。
（《疏證》，卷八，第一百一十三條，頁1421，左下）
05. 余謂《古文尚書》二十四篇無註，正與此同。
（《疏證》，卷八，第一百二十條，頁1442，右上）

表四：《疏證》「〈舜典〉別有成篇」

01. 《古文尚書》雖甚顯於東漢，然未立學官。當時諸儒，苟非從師講授，則亦莫之見也。如〈趙岐傳〉，稱其「少明經」，註稱其嘗讀〈周官〉，不言其受《古文尚書》，則亦不知《古文》為何書也。《孟子》「帝使其子，九男二女」。「岐註曰『〈堯典〉釐降二女，不見九男』」，孟子時，《尚書》凡百二十篇。逸《書》有〈舜典〉之叙，亡失其文」。《孟子》諸所言舜事，皆〈堯典〉及逸《書》所載，則可證其未嘗見《古文·舜典》矣！蓋《古文·舜典》別自有一篇，與今安國《書》，析〈堯典〉而為二者不同。故《孟子》引「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徂落」，為〈堯典〉，不為〈舜典〉。《史記》載「『慎徽五典』至『四罪而天下咸服』」，於〈堯本紀〉，不於〈舜本紀〉。孟子時，〈典〉、〈謨〉完具，篇次未亂，固的然可信。馬遷亦親從安國問《古文》，其言亦未為繆也。余嘗妄意「舜往于田，祇載見瞽瞍」。與「不及貢，以政接於有庠」等語，安知非〈舜典〉之文乎？又「父母使舜完廩」一段，文辭古崛，不類《孟子》本文。《史記·舜本紀》亦載其事，而多所增竄，不及原文遠甚。亦信文辭格制，各有時代，不可強同。《孟子》此一段，其為〈舜典〉之文無疑。然要可為心知其意者道耳。
（《疏證》，卷二，第十八條，頁1115）

表五：《疏證》「《法言》論〈稷棄謨〉」

01. 且〈益稷〉據〈書序〉，原名〈棄稷〉。馬、鄭、王三家本皆然。蓋別為逸《書》，中多載「后稷之言」，或「契之言」，是以揚子雲親見之，著《法言·孝至篇》。或問「忠言嘉謨」曰：「言合稷契之謂忠；謨合臯陶之謂嘉。」不然如今之〈虞書〉五篇，臯陶失謨固多矣！而稷與契，曾無一話一言，流傳於代。子雲豈鑿空者耶？胡輕立此論。蓋當子雲時，〈酒誥〉偶亡，故謂「酒誥之篇俄空焉」，今亡失。賴劉向以《中古文》校，今篇籍具存。當子雲時，〈棄稷〉見存，故謂「言合稷契之謂忠」，以篇名無「謨」字，僅以「謨」貼臯陶。惜永嘉之亂亡失，今遂不知中作何語。凡古人事，或存或亡，無不歷歷有稽如此。
（《疏證》，卷五上，第六十六條，頁1192，右下）

參考文獻

- 孔穎達等撰。《四部要籍注疏叢刊·尚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）。
- 古國順。《清代尚書學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1）。
- 江藩著，漆永祥注。《漢學師承記箋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）。
- 吳通福。《晚出《古文尚書》公案與清代學術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）。
- 李振興。《尚書學述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4）。

- 屈萬里。《屈萬里全集（二）·尚書集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3）。
- 林慶彰。《清初的群經辨偽學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0）。
- 姜廣輝。〈梅鷟《尚書考異》考辨方法的檢討——兼談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邏輯基點〉，《歷史研究月刊》，（2007.5），頁77-94。
- 姜廣輝。〈梅鷟《尚書譜》的「武斷」與「創獲」〉，《湖南大學學報·社會科學版》，23：3（2009.5），頁30-37。
- 崔冠華。〈丁若鏞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基本理路——《梅氏書平》的邏輯基點〉，《湖南大學學報·社會科學版》，23：3（2009.5），頁38-42。
- 梁啟超。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上海：三聯書店，2006）。
- 梅鷟。《尚書考異》（姜廣輝老師整理，參考《白鶴山房抄本》、《臺灣故宮舊抄本》、《文淵閣本》、《平津館本》，未刊稿）。
- 梅鷟。《尚書譜》（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）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經部49（臺南：莊嚴文化，1997，據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影印）。
- 許華峰。「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的辨偽方法」（中壢：國立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，1994）。
- 陳夢家。《尚書通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）。
- 惠棟。《古文尚書考》（據北京圖書館分館館藏清乾隆五十七年宋廷弼刻本影印）。
- 程廷祚撰，宋效永校點。《青溪集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04）。
- 程廷祚撰。《晚書訂疑》（羅惠齡整理，據《聚學軒叢書第一集》影印，未刊稿）。
- 趙銘豐。《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研究》，《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七編》第3冊（臺北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8）。
- 劉人鵬。「閻若璩與《古文尚書》辨偽：一個學術史的個案研究」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，1991）。
- 錢穆。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）。

The Commentary of Ying-zuo Cheng “*Shang Shu Gu Wen Shu Zheng Bian*”

Ming-feng Chao

Abstract

This article is the reflection on the three points elaborated in Ting-zuo Cheng's writing of “*Shang Shu Gu Wen Shu Zheng Bian*.” There are logical consistent points between “*Wan Shu Ding Yi*” and “*Shang Shu Gu Wen Shu Zheng*.” The strategy of textual criticism through analyzing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s and lack of enough instances in “*Shu Zheng*.” And we want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ing-zuo Cheng's writing of “Bian” on *Shang Shu Gu Wen Shu Zheng* based on above mentioned commentary.

Keywords (關鍵詞) : Ying-zuo Cheng : *Shang Shu Gu Wen Shu Zheng* Bian : Ruo-qu Yan
程廷祚 : 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辨 : 閻若璩

Ming-feng Chao : Ph.D. Student, Department Chinese Literature,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; E-mail:
h0petea@yahoo.com.tw